

「活着的白求恩」
奥地利人罗生特

□ 刘志

犹太裔奥地利人罗生特，原名雅各布·罗森菲尔德，1939年冬季抵达上海，经汉斯·希伯、沈其震介绍赴苏北盐城新四军军部参加战地救护，先后在华中、山东和东北解放区从事医疗卫生工作。他历任新四军军部和八路军山东军区医学顾问以及东北人民解放军纵队卫生部部长，被陈毅赞誉为“活着的白求恩”。

从纳粹集中营到新四军军部

1903年1月11日，罗生特出生在奥地利的一个犹太人家，1923年考入维也纳大学，后获得医学博士学位。受父亲和欧洲工人革命运动的影响，罗生特加入了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并积极从事反帝爱国斗争活动。1932年5月，奥地利当局以“参加反政府组织”的罪名判处罗生特1年零2个月监禁。1930年代后期，在纳粹德国密谋吞并奥地利的背景下，罗生特积极投身于反对纳粹德国的地下斗争，于1938年6月被关入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服苦役，历经一年折磨，因证据不足，在第二年获释，但被勒令不准返奥，限期2个月内离境。

之后，罗生特以犹太难民身份抵达上海，并在法租界开办了一家诊所，因其医术高超而小有名气。日军在上海的残酷暴行，令罗生特深刻感受到日本法西斯侵略下中国老百姓所面临的深重苦难。在波兰籍犹太人汉斯·希伯的引领下，罗生特产生了参加新四军战地救护的想法。在希伯的介绍下，经新四军军医处长沈



罗生特与刘少奇、陈毅

其震和材料科长吴之理的考察认可后，1941年3月，罗生特化装成德国传教士，由地下党员秘密护送至驻地位于江苏盐城的新四军军部，为确保安全，沈其震为其改名为罗生特。新四军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对这位来自奥地利的医学博士热情欢迎，安排其任职于新四军总部医院，并兼任卫生部顾问，罗生特也成为苏北第一位参加新四军的国际友人，自此开始了他在中国的军旅生涯。

成为中共特别党员

面对医务人员严重短缺的困难局面，罗生特向新四军领导提议开办培训学校，尽快培养医务人才。1941年，在新四军卫生部重建的同时，华中卫生学校也建成招生。罗生特竭尽所能编写学员教材、自制医用教具、规范学校制度，使新四军的医疗保障工作步入正轨。他还多次到校授课，为学员讲授医学基础理论、生理解剖、内外科、战时护理等医学知识，为新四军培养了大批卫生骨干。

1941年7月，新四军军部暨中共中央华中局从盐城迁往阜宁。由于日伪军占据主要交通线，致使新四军二师、三师、四师师部之间被重重封锁线阻隔。在为军部和当地群众提供医疗救助的同时，罗生特还频繁冒险穿越敌人道道封锁线和沿途据点，在各师部部队间看病巡诊、医治重症病患并进行战时救护。虽然他身患心脏病和严重的夜盲症，并常遭受在纳粹集中营所遭伤病的困扰，但只要接到任务，便立即赶到现场救治；战斗一旦打响，总是奔赴前线冒着枪林弹雨抢救伤员。面对药品奇缺的困难局面，即使在其生病高烧之时，罗生特也不舍得打针用药，坚持把药品留给战士们使用。

近一年的新四军生活令罗生特深刻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与新四军打击日本法西斯的决心与勇气。1942年春，罗生特提出入党申请，陈毅获悉后主动做他的入党介绍人，并帮助他积极进步。1943年初，新四军军部迁往黄花园后不久，经陈毅和新四军政治部宣教部长钱俊瑞介绍，经中共华中局批准，罗生特作为特别党员被吸收入党。

在苏北新四军军部工作生活的两年时间里，罗生特与陈毅结下了深厚友谊。陈毅为罗生特医术高明、决心投身中国革命事业所感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关心他的生活。看到罗生特因环境恶劣、生活艰辛导致形体消瘦，陈毅在心疼之余还向其表示歉意。罗生特或拒

绝新四军供给部门的特殊照顾，或把节省的津贴给体弱的战士购买营养品。他说，“我到这里是来帮助消灭日本法西斯的，而不是来享受的。能够在新四军这样伟大的部队中工作，为中国同志服务，苦和累都算不了什么，我感到十分快乐”。

随罗荣桓转战山东和东北

1942年，甲子山战役后，罗荣桓因操劳过度，突患严重尿血症，且病情逐渐加重。应陈毅邀请，罗生特为罗荣桓诊治。在罗生特的精心诊疗下，罗荣桓的病情逐渐稳定下来，但鉴于山东战场的紧张形势，罗荣桓不得不中断治疗，赶赴前线指挥战斗。当年8月，罗荣桓病情再度恶化，罗生特赶赴山东军区驻地莒南县为其治疗，并出任八路军山东军区115师卫生顾问，直至抗日战争结束。在罗生特的精心治疗下，罗荣桓的病情稳定了。抗日战争胜利后，罗生特随罗荣桓率领的队伍挺进东北，随即投入到前线救援工作当中。1947年，罗荣桓肾病复发，罗生特回到罗荣桓的身边，倾尽全力确保罗荣桓的身体能够应付解放战争时期极其繁重的指挥工作。

1949年9月，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离开家乡10年之久的罗生特，在看到中国人民获得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后，向中共中央提出申请，希望批准他返回奥地利探亲。刘少奇在天津送别罗生特时对他，说：“我们已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开始建设新中国。这中间有你很大的功劳”。罗荣桓夫妇亲自把他送上开往上海的火车。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特意为罗生特定制了一套漂亮西装，在践行宴上，以“活着的白求恩”来高度评价其为中国革命所作的贡献，并为之颁发了用中德文字书写的荣誉证书。

遗憾的是，1952年4月，在以色列探亲时，罗生特因心脏病突发去世，未能实现重返中国的愿望，但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为中国的解放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好医生。



2008年7月，清华大学入藏了一批战国竹简，通称清华简。学校迅即成立了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负责组织、协调校内外的科研力量，从事这批竹简的保护、整理和研究，取得了丰富的成果。

清华简的特点

同已经发现的其他简牍材料相比，清华简有几个重要的特点。

一是时代很早。经碳14测定，清华简的抄写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05年左右，属于战国中期偏晚，相当于孟子、庄子、屈原等先哲们生活的时代。由于这批竹简长期深埋于地下，没有遭遇秦始皇焚书之厄，从而最大限度地保存了先秦古籍的原貌，属于国宝级的奇珍。

二是数量众多。清华简总数达2500枚，将其中一些残断的简拼接缀合后，总数约有1800支，这是迄今发现的战国竹简中数量最大的一批。

三是内容珍稀。清华简全都是古书，以儒家经典和历史著作为主，经过编排，总共约有70篇文献。这些文献绝大部分已经失传2300多年，涉及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价值可谓空前。它们所产生的影响也将至为深远。

从2010年起，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开始陆续编写出版清华简的系列整理报告，迄今已经出版了10辑，第11辑整理报告将于2021年底正式对外公布。已经获得整理公布的40多篇文献，全部被收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

清华简的学术价值

目前，清华简的整理工作已经过半，但是研究工作才刚刚起步，学者们对于它们的认识也还很肤浅。因此，当前讨论清华简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研究产生的影响，也还只能是初步的，随着整理和研究工作的展开和深入，清华简的学术价值将在今后不断得以体现。从目

清华简的独特性

□ 刘国忠

第三，发现了前所未知的周代诗篇。清华简《耆夜》一篇，记载周武王八年征伐耆国（即黎国）得胜回到周都后，在文王宗庙举行“饮至”典礼，参加者有武王、周公、毕公、召公、师尚父等人。典礼中众人饮酒赋诗，诗的内容均见于简文。该篇与《尚书·商书》的《西伯戡黎》相关，并纠正了《尚书大传》《史记》以为伐黎为文王时事的说法。这篇竹简既有历史价值，又有文学意义。其中周公的一首诗竟然与传世的《诗经·唐风》中的《蟋蟀》一诗有密切关系，更是出人意料。另外像《芮良夫谏》《周公之琴舞》等篇中大量雅、颂类诗篇的发现，更为先秦文学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资料。

第四，复原了楚国历史及历史地理。清华简《楚居》详细叙述了历代楚君的世系及定都之地，为楚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及文物考古工作提供了大量线索，有力推动了楚文化研究的深入开展。另外，从清华简等材料中可以看到，自西周以来被贬斥为蛮夷的楚国，此时也已深受中原华夏文化的影响，而且对这一文化传统作出自己的贡献。应该说，这是当时中国各个民族互相融合、文化彼此交流的大趋势所造成的，这也进一步证明，中国自古是多民族、多地区的统一国家，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为各民族、各地区人民所共同缔造。

第五，推动了古文字特别是楚文字的研究。清华简所用文字系战国时期的楚文字，由于数量庞大，从而为楚文字的深入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清华简的内容皆为古书，有些有传世本或在传世本内有类似材料，学者们可以通过与传世本对照或对相关文例进行深入研究，从而识读出许多过去不认识或者误识的楚文字。如果在此基础上进而与甲骨文、金文等材料进行对比研究，还可以进一步解决甲骨文、金文中的许多疑难问题，从而在古文字研究方面大放异彩。

第六，发现了中国迄今最早的数学文献《算表》。清华简《算表》全篇由21支简组成，是一篇图表形式的简文，上面填写了许多数字，结构奇特。经研究，这篇《算表》不仅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早数学文献，而且具有计算功能，可以便捷地进行乘、除以至乘方、开方的运算，其便捷程度与丰富内容受到国内外学者的极大重视。2017年4月，经吉尼斯世界纪录认证确定，清华简《算表》是世界上最早的具有计算功能的十进制数学图表。

第七，提供了解决《周易》之谜的重要钥匙。在清华简中有一篇与《周易》关系密切的文献，科研人员将之命名为《筮法》。《筮法》共有63支简，保存完好，在入藏时仍然成卷，不曾散乱。经过小心揭剥与整理，全篇完好无缺，证明是楚国专论《周易》占筮的书。简中附有图解，并详细记载各种“数字卦”的涵义和吉凶，对于《周易》的研究极有价值，有可能对于解决中国古代的“数字卦”问题有重要的帮助。

第八，加深了人们对于古书及古籍整理工作的理解。清华简中的许多古书都涉及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这些经典书籍的传世本千百年来经过了无数学者的精心整理，凝聚着无数学者的心血和汗水。现在，我们看到了这些经典的原来面貌，自然可以对历代学者整理工作的艰辛有更多的体会，也能够更好地指出他们整理工作的得失情况，总结经验教训，为将来的古籍整理工作提供更好的借鉴。因此，清华简的整理工作也可以很好地推动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工作。

第九，丰富了人们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思想的认识。清华简以经、史类典籍为主，有不少富有思想性的文献，如《治邦之道》《治政之道》《邦家处位》《天下之道》《虞夏殷周之治》《厚父》等，其中蕴含了丰富的治国理政思想，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重视，也引起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如《厚父》篇中有关于“民心惟本”的论述，把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上推到了西周早期；《治邦之道》主张由明君来治国理政，倡导举贤用能，并强调要不拘一格选拔人才，“虽贫以贱，而信有道，可以取众、治政、临事、长官”；《天下之道》是一篇与军事相关的文献，主张用兵之道不外乎进攻或是防御，简文称之为“天下之道二而已，一者守之之器，一者攻之之器”；其他如《成人》篇强调要依法治国，执法必严；《治邦之道》倡导大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提倡节俭；等等。这些思想对于我们当今都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中华文明的早期特点

□ 顾 春

从今天的考古发现来看，中国的古代文明发源地并非一个，但最早兴盛起来的地方是在黄河中下游流域。居住在这个地方的人被称为诸夏。早期文明阶段，人们自发形成聚落性质的城市，而从城市向外延伸的范围，叫做“城”，到了文书行政统治领土国家的时代，“城”被周边疆域包围，就产生了“國”（国）。从文字学角度看，城和國是相关联的，从城到国是一个发展壮大的过程。国的外边被称为野，国与野合而为邦。所以我们可以说联邦，而不能说联合国。由于最初的诸夏居于黄河中下游区域，与周边民族相对而居其中，故称“中国”。“中国”一词最早可见于西周时期青铜器上的何尊铭文，到战国时期已普遍使用，并与夷狄相对，如孟子就说“莅中国而抚四夷”。总之，与周边民族相比，诸夏的经济和文化发展最早，代表着文明和先进。由此，先进的诸夏便被称为华，周边的民族便被统称为夷，于是诸夏又称华夏，中国又称中华。

华夏文明大发展的重要标志就是众所周知的百家争鸣。一般认为，百家争鸣起于春秋末期的孔墨之辩，持续到战国时期齐国稷下学宫的消亡。在这长达200多年的时间里，诸子蜂起、处士横议、各家并出，前后相继，迎来了著名的百家争鸣。诸子百家的著作在蒙受秦火之难后，又历经长时间的岁月淘洗，现已难窥全豹。但即使从留存下来的典籍看，它们所表现出的辉煌气势、庞大规模、华贵气派和深邃思想依然令人叹服和低回向往。当我们今天重新读其书、想见其为人时，依然受到巨大震撼。诸子百家不仅围绕着王与霸、礼与法、义与利等治国大道展开激烈争辩，也广泛涉及天道与人道、天命与人事和名与实、志与功等抽象玄远的哲理思辨，不仅为秦统一中国作了相应的理论准备，也大大提高了中华民族的理论思维水平，大大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精神生活。

近百年来，大量出土文物特别是殷墟甲骨的发现，使我们对两千多年前的遥远时代又有了新的更深认识，其源有自的先秦文化及其发展过程和脉络变得更加清晰可信。

从先秦出土文献和各种早期典籍的文字表现形式看，其发展脉络正如一个小孩学说话，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发展过程——甲骨文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老子》《论语》是一句一句的（春秋末期），《孟子》是一段一段的（战国中期），《韩非子》是一篇一篇的（战国中后期），随后的著作是一部一部的。

更为重要的是，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认定：早在先秦时期，作为早期中华文明的最杰出代表，华夏文明就具备了两大重要特点，一是早熟，二是高度发达。早熟的特点预示着之后的中华文化会接续先秦文化发展下去，而不会因为文化稚嫩而夭折；而高度发达则对周边民族产生强大的吸引力和向心力。在此基础上，就有了华夏之辨。在华夷关系上，华夏对诸夷主张“以夏变夷”，虽有夷夏之别，但并不是以夷为敌，并未把夷排斥在外。而周边的夷族，既向往华夏，又不自甘为夷，纷纷主动学习华夏的礼仪制度，于是这些夷族也就逐渐归于华夏。所以，华夏文明的早熟和高度发达，使华夏族像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这种滚动既是地域越变越广的过程，也是人口越变越多的过程，更是各民族不断加深交流和融合的过程。到了秦统一中国之初，华夏族已大体形成了三个文化圈，即三晋齐鲁文化圈、关中文化圈和楚越文化圈。到了汉朝，随着民族融合和民族认同的不断演进，生活在这三个文化圈中的人们逐渐形成了更加相近的民族意识、民族性格、民族文化和民族习俗，于是这三个文化圈在汉朝逐渐融合为共同的中华文化圈，并随之诞生了中华民族的主体——汉族。

早熟和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对秦汉以后的历史持续产生着巨大影响。其中，先秦的华夷论又被西汉儒家的公羊学派予以理论化。公羊学派继承孔子的华夷思想，一方面主张严夷夏之防，坚持华夏中心论，反对以夷变夏。另一方面，又主张以华变夷，通过怀柔四方，使近悦远来。认为凡是赞成并实行中国的典章制度和文化的，夷狄就变成了中国，这是融合后的新的中国；而虽居中国却行夷狄之道者，也就不再是中国，而是新夷狄。公羊学派的这些思想为后世的政治家和思想家所继承，比如，唐代的韩愈曾说“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进于中国则中国之”，这与公羊学派的主张是一致的。

总之，作为早熟和高度发达的中华文明，在数以千年计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始终保持着文明领先的地位，这也成为中国长期作为东亚地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原因。

